
夏炎德著

中國近百年經濟思想

自序

英遊以還，在各大學擔任講席，極思對中國經濟作進一步之研究，以覓取解決的途徑。從事此項工作，必須從新的角度，一方面看清世界經濟的思潮與趨勢，一方面參酌本國的環境，並針對人民的需要。同時對近百年來本國經濟思想的演變，亦擬加以檢討，評論得失，以供日後建設的參考。著者蓄此意已久，民國三十年時，適值何炳松、杜佐周先生等，由中英庚款董事會撥款，在滬創辦學林雜誌，以「中國近百年經濟思想」為題，向我徵文。我即乘此着手撰述，費三月而成此，內凡八章，原第七章在野黨魁的激進言論，詳述陳獨秀、李大釗等的思想，經編委會審查後勸我刪去。方已排成一半，太平洋戰爭突然爆發，學林被迫停刊，我也離滬入川，原稿留置開明書店，存佚不暇計也。

去秋（三十五年）復員東返，周予同先生為道此稿之伴存，承他好意代為檢出，重加校閱一

通，連後在渝發表數文併置一起。內子呂玉文女士讀了甚感興趣，認為仍有公開的意義，乃改交商務經農先生發行，特記經過如此。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緒言.....	一
-------------	---

一 中國的傳統經濟觀念.....	一
------------------	---

二 晚清經濟思潮之轉變.....	七
------------------	---

第二章 清代重臣的富強政策.....	一三
--------------------	----

一 曾國藩之學夷技以制夷術.....	一三
--------------------	----

二 李鴻章之洋務運動.....	二一
-----------------	----

三 張之洞之中體西用說.....	二八
------------------	----

第三章 駐外使節的洋務獻議.....	三九
--------------------	----

一	郭嵩燾的洋務疏·····	三九
二	薛福成的籌辦議·····	四三
三	馬建忠的富民說·····	四八
第四章	維新志士的變法理想·····	五五
一	康有爲之大同小康義·····	五五
二	梁啓超之生計叢論·····	五六
三	嚴復之西學圖強觀·····	七三
第五章	官商鉅子的實業方案·····	八六
一	盛宣懷之鐵路國有案·····	八六
二	張謇之棉鐵政策·····	九二
第六章	革命領袖的民生主義·····	一〇二
一	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	一〇二

二	朱執信之社會革命辯……………	一二一
二	廖仲愷之統一財政計畫……………	一二八
四	胡漢民之民生主義解……………	一三五
第七章	結論……………	一四六
一	過去經濟思想的評價……………	一四六
二	今後經濟理論之建設……………	一五一
附錄	……………	一五八
一	中國經濟思想之輪廓……………	一五八
二	中國近三十年來經濟學之進步……………	一六四
三	中國抗戰期間經濟研究之成績……………	一八八

中國近百年經濟思想

第一章 緒言

一 中國的傳統經濟觀念

經濟思想是經濟環境的產物，而又足以支配當時及以後經濟的趨向。在今日我們要確定今後中國的經濟制度與政策，最緊要的固須看清當前本國與世界的經濟情勢，但對於過去的經濟思想也不能輕易忽視。尤其是過去一百年——從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是中國整部歷史的轉變期。這時期各派經濟思想的起伏及其得失，於目前國民經濟情況有深切的關係，應當細加檢視。經濟思想之具有完密的、科學的系統的，稱為經濟學。這種經濟學說，

在中國至今還未見有自創的出現。(註一)一般經濟學界的著作，大多係編譯或轉述性質，無足深論。故本文所述，專着眼於國民經濟改造的思想。這種思想雖屬於經濟方面，然與政治改革、社會運動、及文化潮流不能明白分開，而發爲主張的各家也少有專治經濟學的，大多是些政治家、實業家、革命家、以及社會運動家。他們的經濟理想與實施，對於國民經濟直接間接都會發生鉅大的作用，宜作爲我們檢討的對象。

在中國經濟發達史中，百年前的鴉片戰爭是一個重大關鍵。那次戰爭乃外力侵入的第一聲。它打破了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狀態。在戰爭以前，中國經濟大體上是一種單純的封建的形式。經那次戰爭之後，中國經濟起了一種劇烈的變化，而變成半封建半資本主義與半獨立半殖民地複雜形式。這種情形，很清楚地反映在經濟思想中，劃分出兩個顯然不同的時期。

封建社會的根本特徵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工業不發達，小規模的家庭工業，如紡織等，只是農業的副業，商業甚爲社會所輕視。中國自漢族從西方來到黃河流域建國的時候，即已是一個農業民族；且在東周時，農業技術已相當發達，如用鐵器耕種，並知道灌溉排水的方法，「以農立國」

成爲相傳的國策。中國古來傳統的經濟政策，根本上都是一種「重農主義」(Physiocracy)。歷代帝王大臣都把農業看作最重要的生業，這可從他們的詔書、奏疏、與法制中顯然看出。周公授民職業，將三農列於九職之首。秦商鞅說道：「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漢文帝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晉人趨驚商業，政府用課重稅的方法使他們歸農。漢、晉以後，這種政策都相沿不變。卽至清代，還一仍舊貫，如康熙二十九年上諭中謂：「阜民之道，端在重農。」雍正二年諭戶部道：「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慮念民依，重農務本。」乾隆二年諭農桑爲政治之本，又說：「朕欲天下之民，使皆盡力南耕。」在這種重農主義之下，全國人口百分之九五以上從事農業，工商業毫不發達。工業技術的改進非但不被獎勵，且卽有發明，也常被「奇技淫巧」之辭所鄙薄。商業在兩漢以後歷被輕視，經商牟利爲社會所恥言，商人的社會地位非常低落，加上交通工具拙劣，貨物運輸也感不便。工業只是些小規模的手工業，如最重要的紗織業，便是一種附屬於農業的家庭工業，由婦女乘農隙操作，卽所謂「男耕女織」，且多半爲自己消費，攜往市場銷售的極少。其實就是農業，在原則上雖被提倡，但對農事並不講求。農民在周末已用鐵器耕

種，現在所用的農具與之相彷彿，農業技術沒有多大的進步。

講到思想家與學者的觀念，自然比較複雜。約在周朝末期，因社會制度正在轉變，經濟思想非常發達。其中老子、莊子代表道家，主張消極無爲，類乎無政府主義（Anarchism）；孔子、孟子代表儒家，注重倫道仁義，不失淑世的保守主義（Conservatism）的特質；管仲、商鞅代表法家，講求國家富強，近於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楊朱附於道家，修言爲我享樂，可說是一種利己主義（Egoism）；墨翟代表墨家，盛倡博愛公利，帶有宗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的色彩；許行、陳相代表農家，力持「並耕而食」，有如近世的勞農主義（Agrarianism）（註11）這是一個思想上的黃金時代。時間可並不久，到秦統一起便沈寂下來。秦朝在政治上實行中央集權，在經濟上獎進商業資本，而時間也很短暫。漢興以後，封建勢力重見高張，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思想統於儒家一尊，自此孔、孟思想成爲中國的正統思想。儒家所講的主要地是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他們在倫理的著作中論經濟，且以倫理的觀點論經濟，所謂「爲道德而謀經濟，非爲經濟而設道德」。孔、孟而下都好談道義，惡言利，如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對於近代經濟學者

所重視的人生自然欲望不主張充分滿足。孔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孟子說：「養心莫善於寡欲。」他們非但不講個人的小利，即爲社會謀大利也少論及。他們的政府職務觀是消極的，對於國民經濟主張無爲而治，即採西洋的所謂放任政策（*Laissez-faire*），故理財也主節用，以「不傷財，不害民」爲原則。儒家這種思想深入人心，歷代執政者奉爲圭臬，對於社會經濟多抱聽其自然的態度，即遇豪強大戶壟斷兼併，也少有採取統制的辦法。偶有少數懷抱大志想用政府力量實行干涉政策（*Intervention*）爲國興利的人，往往被用「與民爭利」的話箝制。商鞅、王莽與王安石都戰勝不過這種傳統思想而失敗了的。

過去中國生產技術的不進步，大部分須歸之於學問與生產的脫離關係。在古代，聖人本是大發明家和大工程師，故禮記中有「作者之謂聖」，考工記中有「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的話。不過到了周末，諸子百家各樹社會學說，不復以指導生產爲事。如孔子就沒有從事生產，他自己「四體不動，五穀不分」，也不重視生產，如說「耕也，鋤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且不研究生產，其智識「不如老農，不如老圃。」孟子輕視體力勞動，曾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

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這些話很像希臘哲人所倡的奴隸與智者分工一樣。從此學問漸從現實生活游離，入於官學的岔路，學者略涉經籍策論，便以之游說獵官；而科舉取士亦以文章詩賦，許多優秀之士的日力都耗費於此。至在野學者多以修身與養性爲日課，潛心於性命天人之道，也使學問趨於幽玄的境界，以致中國文化雖有悠久的歷史，而物質科學仍然非常落後。

中國傳統的經濟思想，分配重於生產，「均富」觀念特別發達。孔子說的「安無寡，均無貧，」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話，最足以代表。如土地——農業經濟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分配制度便是比較平均的，雖不免有兼併的事實，可沒有像西洋那樣的大地主發生。家族的遺產並不由長子繼承，而均分於諸子，這樣產生了許多小農；其優點是財富分配比較平均，其缺點是將農場分割太碎小，不能應用進步的生產方法。新的生產方法雖間有發明，可沒有普遍應用。因爲中國人口繁庶，若用省力的方法，將使勞動過剩，許多人的生活發生問題。所以寧願抱殘守缺，安於拙劣的生產方式，甘於低下的生活程度。這種苟安保守的觀念，實使中國四千年來的國民經濟，一直陷於停滯不進的狀態。（註三）

二 晚清經濟思潮之轉變

中國過去的經濟若與西洋比較，則我們忽視了生產效率而保持分配均勻，他們是犧牲了分配均勻而完成生產效率；雖然各有特點，但終究我們是消極的知足的，他們是積極的進步的。所以中國經濟發達雖早，而有讓西洋後來居上之勢。這兩種經濟如果不加比較，中國不會覺察自己落伍。我們的祖宗大多懷着一種成見，自尊爲天朝上國，而鄙視他國爲夷狄之邦，深信中國固有文化之外，沒有第二種文化。約在十七八世紀的時候，英國產業已在漸漸發達，看到中國是一個廣大的市場，不惜卑詞要求通商。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要求在廈門設商館，清政府沒有允諾。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再要求訂約通商，只准許英人在廣州設立商館。（註四）

清政府固持這種鎖國政策（Close Door Policy），想繼續維持自給自足的生活。然英國政府並不就此罷休。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八年）又遣馬喀尼勳爵（Lord Macartney）等一行使臣前來，提出幾項要求，如派員在京照管本國商務，英商在京開設商館，並多予貿易便利等。政府

誤以爲他們是來朝貢的，不會答應他們的要求。乾隆在諭覆英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的詔書中云：「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片、絲斤，爲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需餘潤。」又云：「若經此次詳諭後，爾國王或誤聽爾下人之言，任從夷商將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嚴，各處守土之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爾國夷商徒勞往返，勿謂言之不豫也。其懷遠勿忽！」（註五）這些話在今日看來，不免自大，對外力不免估量太低。後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英國續遣使臣安赫斯德（Amherst）來要求，也遭遇同樣的結果。

其實在十八世紀末葉，英國的工業革命已經發動，且已著有相當成績，如瓦特（Watt）在一七六三年完成蒸汽機，哈格里夫（Hargreaves）在一七六四年發明紡織機，阿克來特（Arkwright）在一七七一年設立紡織廠，克隆登（Crompton）在一七七六年製造鐮紡機，其製造的量與質都已遠非我們所能及，要是那時乾隆及其大臣明白此中真相，對於自己冒失的態度也許會啞然失笑吧。不過那時英國工業革命尙未全部完成，資本主義勢力尙不十分雄厚，如果能夠立時憬悟，改

變觀念，取彼之長，迎頭趕上，說不定以後一切辱國喪權的事可以不致發生。可惜當時的政府對於世界大勢缺乏真正的認識，一味做着自尊自大的好夢，悠悠忽忽，終於錯過了及時振作的大好機會。

從十八世紀下半期到十九世紀上半期，英國生產力的發展真是一日千里。他們有過剩的商品、資本、與人口，需要找尋國外市場，投資事業，與殖民地。英國的國策也從純作經濟侵略的資本主義化爲兼作政治侵略的帝國主義。在這樣發展的要求下，印度首先被併吞，然後又以印度（東印度公司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便是經略遠東的大本營）爲據點，進而佔據馬來半島，再進而向中國侵略。對於清政府過去所給與限制貿易的辦法不復滿足，要求取消行商制度，（註六）結果未能如願以償。他們決心要獲得中國市場，外交的方式既未奏效，乃改以武力奪取。會值一八三八年十一月中國禁煙運動領袖林則徐燒毀了英人販賣的鴉片兩萬多箱（價值一百萬鎊以上），英人即藉端尋釁。在事萌，林則徐的態度非常強硬，在致英王移文中末後有「天朝所以能服外國者，正有不測之神威」等語，但中國的軍備情況早被外人看穿，決非虛聲恫嚇所能濟。

事。一八三九年十一月英艦向廣州開火，砲臺與船隻很快地被擊燬沈沒；並乘勝北上，連陷浙江沿海與長江一帶幾個城市。到一八四〇年，復切斷京師漕運的路，且有直逼南京之勢，清政府逼着祇好對英屈服，在「康瓦爾」（H. M. S. Cornwallis）號兵艦上簽訂江寧條約，除了賠款二千一百萬元，割讓香港等外，更重要的是廢除商行，抑低進口稅率，並開五口通商。至此中國四千年來緊閉的國門遂被洞開，不得不改行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了。

鴉片戰爭的失敗是必然的，這不是疆臣戰士的功罪問題，而是兩國國力的強弱問題。以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與產業先進的國家戰，以舊式的武器敵新型的砲艦，其失敗之數原是預定了的。自江寧條約開了一個惡例，列強相率倣尤，不久英、法又要挾訂立天津條約（一八五八年），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年），俄國要挾訂立璦琿條約（一八五八年），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年）。我受此重重束縛後，關稅不能自主，外貨可以暢銷無阻，給與內河航行權，外輪可以行駛自如，承認領事裁判權，外人可以橫行不法，加上扼住了幾大商埠的咽喉，列強的經濟勢力可以長驅直入，深入吾臟腑腹地。中國經濟遂一天一天走上殖民地的路。

自列強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停滯的經濟即起劇烈的變化。我不能自固藩籬，外貨、外資如潮湧而入；結果，本國農村衰落，手工業淘汰，鄉村城市失業人口增加，生產沒有發達，而新式消費習慣已經養成，僅有的資本涓涓流出，國民經濟呈江河日下之勢。在這種嚴重的情形之下，我國無法苟安自全，而古方也醫治不了新病。易經上說：「窮則變，變則通。」羅素說：「思想不是人的自然活動，而是病的產物，有如病時發高熱一樣。」（註七）中國正處窮變之時，痼疾滿身，一般有識的智識份子開始覺悟，非改變祖宗成法，不足以應付此鉅大的世變，而使國計民生轉危為安，於是各種各樣經濟改造的思潮應時而起，匯為先秦以後未有之大觀。在這中國經濟困頓的局面中，中國經濟思想展開了新頁。

（註一）唐慶增氏在所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卷中說「中國原無經濟科學」（頁一）。其實直至今日，也未見有獨立的經濟學說出現。

（註二）日人渡邊秀方將許陳思想看作無政府共產主義，說「許子的道，蓋共產的道。」（劉佩元譯中國哲學史概論第四編第四章。）這不免附會而且過其其詞。他們不過提倡上下一齊從事勞農，並沒有提出一種共產的經濟制度。

（註三）亞丹斯密（Adam Smith）嘗論中國自然環境優厚，而國富不因之增加，且長久停滯不通，是由於政制與